

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徐秦法, 梁轩铭

[摘要]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巨变, 以马君武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学改良思想、革命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经历了孕育萌芽、初步形成和完善成体三个发展阶段,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虽然仍存在些许“未完成的转变”, 但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已是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典范, 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 马君武; 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19)06-0016-06

DOI: 10.13624/j.cnki.jgupss.2019.06.003

马君武先生是国内比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在论述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时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并称“马克思者,以唯物史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该文所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列举了26部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其中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5部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是最早在中文书刊中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的介绍。研究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助于还原近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认知,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参考借鉴。

一、马君武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脉络

马君武成长和生活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疯狂进行海外扩张、抓紧侵略,社会关系错综

复杂、各类矛盾交织出现,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爱国救国运动此起彼伏。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脉络大致分为:孕育萌芽、初步形成和完善成体三个阶段。

(一) 孕育萌芽

马君武自幼聪慧,六七岁时就能以“鸟鸣春”对上老师出的“鸡唱午”三字对联,深得老师的称赞。十四五岁便对《四书》《诗经》等大量文史书籍和经典小说烂熟于心。儒学思想以及维新改良思想深刻影响马君武的思维方式。青年马君武时常听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目睹了封建礼俗统治下的中国是如何被列强欺凌却不能反抗,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有了新的认识,深刻意识到必须变革现有体制才能得以重振国力。因此,在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接触过程中,他难免会不自觉地套用中国的传统范式与之类比,建构新的救国方案,如用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解释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大同社会等,其马克思主义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朴素性质。

[收稿日期] 2019-06-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研究”(19VSZ019)

[作者简介] 徐秦法(1971-),黑龙江哈尔滨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梁轩铭(1993-),广西南宁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初步形成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同样遭受到了西方入侵。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摆脱了被侵略和沦为殖民地的困境。日本更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中，成为了称霸亚洲的强国。短短数十年里日本涌现出大量的革命思想，特别是被誉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双璧之作”的《社会主义精髓》和《我的社会主义》广为流传，日本成为了继欧美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另一条路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给留日学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日留学的马君武凭借娴熟的中西文功底、睿智的才思“作文以投诸报馆，以谋自给”^[1]。接触到大量的各流派思想代表性著作，让他意识到必须通过革命、争取民主和独立，才能解救中国人民，促使他从改革者转变为革命者。在此期间，他“寸阴是惜，日必千字”，将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卢梭民约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著作译为中文发表于《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进步刊物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观。

（三）完善成体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改变人们受剥削和压迫的现状，马克思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第一国际”等国际工人运动协会在各国创建和发展，领导和推动者国际工人运动。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在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批判和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中文报刊中，马克思名字首次出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恩，主于资本者也。”^[2]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广泛传播，但是已经被少部分的中国人所了解。同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成果和迅猛发展，也让拥有大量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前途和希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使马君武等广大知识分子

认识到了其与过去的社会思想的区别，促使他们在思想上由改良主义者转向革命者而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与梁启超等改良派划清了界限、投身革命后，马君武先后发表了《弥勒约翰之学说》《圣西门之生活及学说》《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等文章，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其马克思主义观逐渐完善，发展成为完整的逻辑体系。

二、马君武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内涵

在日本留学期间，马君武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研究，较为出名的著作是《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圣西门（一作西士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等。回国后，马君武先后在《走上俄罗斯的路》等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学派观点和思想。其马克思主义观基本涵盖了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解和评价，蕴含着对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思考。

（一）关于唯物论历史功绩作用

马君武对唯物论极为推崇，唯物论是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他提到法国人民之所以能够通过革命结束君主专制，开辟新的革命时代，正是因为唯物论的功绩。唯物论帮助人们破除了宗教迂腐的理论禁锢，扫除了一切蒙昧愚钝的习性，增长了见识并在实践中发现和检验了真理：“董通^①之徒之共和事业，无一不来自唯物论来也”^[3]。他认为，唯物论在法国大革命中起着启迪民智、将民众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本性的作用，让民众能够在社会腐败之时、同胞苦难之时奋起革命，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的共和理论，同样源于唯物论。

同时，马君武在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进行对比的时候，更是进一步强调了唯物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马克思之徒，遂指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达尔文虽非唯物论者，然其学实唯物论（Materialism）……欲救黄种人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4]可以看出，马君武明确认识到要推翻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改变中国被外来列强侵略的现状，只有大力倡导唯物论才能够做到。唯物论对于中国而言，是改

^① 今译丹东，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运动家。

造国民性、从思想上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良方，必须大力弘扬和传播。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动力源泉

“人群者，乃由下等生物进化之所成”^[4]，马君武强调人的产生是竞争、进化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周而复始循环重合的，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类的“野蛮人之言”^[4]。他猛烈地批判：“中国乡人有谚语曰：‘不听老人言，灾害在眼前’……教世人空无所为，徒抄袭古人之蓝本而已”^[5]，虽不会造成灾祸，但实质上是在断送中国未来的守旧绝命之词。在中国，要想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改变道统继承思想，要敢于去突破，以实现社会发展的向前飞跃。

就社会发展形态而言，他认为由于人群间的竞争，人类社会历史大致经历了：“野蛮狃猿之时代”“家奴之制”“农仆之制”及“自由作工之制”^[4]（即雇工制）四级，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马君武译介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4]，将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引入中国并探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4]。他认为，社会形态发展并不会仅限于“雇工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冲破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界限，达到全社会共同所属、共同经营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因此，他主张中国也应该像欧洲一样，建立雇工制，用强大的政府来加以管理，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中自由竞争。

（三）关于追求公利的价值取向

马君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寻找“公利”、明辨社会与个人价值。他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文明成果进行比较，论述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达氏以为物种竞争，最宜者存；社会党人以为人群当共同和亲，利益均享”^[4]。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不同于“发达”和“争利”的理解，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追求是每个人和睦、利益平等，主张争利是万恶的起源。

“莫若合大群以谋公利，是不惟可以解民数之难问题而已，亦可以解一切难问题，此社会主义之奇想也。”^[4]马君武认为，以大多数人的

“公利”为出发点，不仅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越来越多的问题，还能让人与人在竞争中兼顾社会公德和社会道德，并以此为良性循环的起点，进而改造全体国民的国民性，改造国民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社会发展更加迅速，进而解决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因此，他指出社会主义实际上比达尔文主义所提倡的进化论更为完善和进步：“故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虽谓达式主义得社会主义而其意乃完，可也。”^[4]这让更多中国人开始思考“公利”和“私利”、公共利益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让更多知识青年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为后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关于社会主义观点的评价

“社会主义者 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 Saint-Simon，佛礼儿 Fe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 Lewis Blane，布鲁东 Proudl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 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 Karl Marx。”^[4]马君武是我国最早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起源、演进过程及流派的人之一，对于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进行了相对比较全面的叙述，提及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较为客观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概况。

同时，他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托马斯·摩尔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03年3月，马君武发表了《社会主义鼻祖德麻司摩尔之华严界观》，对托马斯·摩尔所著的《乌托邦》描述的英国社会的丑恶现状和未来社会的幸福安乐进行了介绍，并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实为欧洲改革之原动力”，“为当时英国出版书中最大之杰著”^[6]。他认为摩尔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价值，充分肯定了摩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实仁慈之社会改良家也，实人群历史上只社会罪恶大批评家也，实提出新社会之大理想家也……实共产主义之开辟大祖师也”^[6]。这与当下将《乌托邦》发表作为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一致，也体现了马君武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变革现实的坚定革命信念。

在讨论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出现的先后顺序时，他考证道：“佛礼儿之倡导社会主义者，实在圣西门之先，佛氏当于1808之时，已著名之《四动力论》^①，惟其书初几无

人读之，及至圣西门及侯盈^②之社会主义大倡以后，佛礼儿之运动始有效。故言法兰西社会主义之创始者，必首圣西门，而佛礼儿次之”^[7]。这与恩格斯对19世纪初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断不谋而合，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初步阐述。

此外，马君武认为圣西门主张的是中央集权，“社会之归旨，在合人群之能力，以开拓地球”^[7]，而傅立叶则主张“地方和个人的自由分治”^[7]，对早期社会主义者作出了客观评价，扩大了社会主义在国内的知晓度。

值得注意的是，马君武还将不同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的书目列成清单供读者参考，其中更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品《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这些经典著作基本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中国其他研究者和学习者开辟了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道路，为其他致力于寻找新的救国道路的仁人志士指明了方向。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功能

马君武认为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扫除社会发展弊症解除困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功能。他在德国和日本切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达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文明，也目睹了资本主义底层人民生活的困顿，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深有体会。他认为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大量劳动成果和资产积聚在资本家手中。为创造和获取更多的资本，雇佣制进一步地发展壮大，于是“今世财产之制，以少数之业主，制奴多数之雇工”^[7]。雇佣工人虽在名义上取得了自由，但大多数出身贫穷，困苦生活难以继，仍然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存资料，所以这种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对立，而这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制度，本身就不是一种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善制”。在这种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制度体系下，“盖据产业为私有之弊，在业主惰废而无所事事，雇工以其产业之非己有也，无爱其产业之心，则自无勤于力作之效”^[7]。在私有制下资本家坐享其成，而雇佣工人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全都不归自己所有而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资本家“只顾生产，不管调剂，致大量生产的货物，

无销售的地方……德国人口六千万，失业者占有六百万”^[8]。生产过剩和忽视分配，不仅加剧了数以千万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负担，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扩大。大量的失业人口带来了大量的乞讨流动人口，娼妓、盗窃等社会问题凸显，人民生活的凄惨状态“令人目不忍睹。闻现在英国亦是如此”^[8]。他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同时也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称赞，提出要消除这种弊端，只有“以土地为共产，而合君力以开拓之。还以社会之土地，托诸社会之人民”^[7]。尽管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弊端的揭露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没有提出明确具体的消解路径，但是在资本主义刚获得初步发展的中国，能对资本主义弊端有所认识已经难能可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开辟了道路。

同时，马君武最早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性和存在价值，“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4]，认为社会主义学说不仅是现实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蕴含着最新、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公理。他以学生升学需要更换教科书为喻，类比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理论也应当随之进步，“现在争利之制度乃旧教科书，而社会主义，乃新教科书”^[4]。“争利之制度”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制度也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4]，他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还称赞社会主义是有进取之心的国人都欢迎、顺乎民意的制度，更是预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前景。

（六）关于以俄为师的救国思考

现实是马君武马克思主义观的落脚点，以“俄”为师、教育救国体现了其现实关照和家国情怀。马君武弃政从文后亲自创办了广西大学，随后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一职。虽远离政坛，却仍然为中国前途所担忧，为中国摆脱穷困局面而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人才，通过各类集会演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① 今译名《四种运动论》。

② 今译欧文。

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政府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多次“围剿”，执行不抵抗政策。马君武主张发动、依靠工农群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把民众武装起来，团结本身的力量去努力奋斗……联合世界上被压迫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以铲除我们共同的敌人”^[9]。

同时，他将俄国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共产主义政策、斯大林领导实施“五年计划”发展民族工业以实现工业独立的情况，以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所应对外来列强侵略的策略向学生进行了介绍：“上至最高的政治领袖，下至一个厨夫都节衣缩食……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牺牲精神……将这些农产品卖与外国，要得一笔大款，向外国购买机器，聘请工程师，试行他们的建设工程——五年计划”^[10]。可以看出，他不仅肯定了苏联的农业集体所有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计划经济和举国之力发展经济等政策的正确性，更类比中国“刻下我国之实情与苏俄前昔，正相仿佛”，提出要“以苏俄民族独立运动成功的实例，拿来做个前车，认真充实我们民族的力量”^[11]。这无疑加强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和知晓度，促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头之时纷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

三、马君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

马君武通过翻译、评价许多西方社会主义著作，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并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受阶级立场和当时中国主流思潮所限，马克思主义观仍存在着“未完成的转变”：一方面，马君武最初只是单纯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与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卢梭民约论一样的欧洲文明思想，介绍给国人以改造“国民性”。因而他认为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具有光明前景的西方学说，但以中国当时社会状况、中国国民的智慧和道德发展水平，并没有达到能够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程度。另一方面，他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但必须要承认，马君武始终是广西、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亮节高风，可

以称的近代中国文人中以各可贵的典范。”^[12]，周恩来同志更是称之为“一代宗师”，对其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已是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对我们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树立和坚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第一，用实践语言践行马克思主义，坚定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出来的。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不足在于没有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真正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当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做到“学马”“用马”“讲马”“信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第二，用世界语言丰富马克思主义，坚定制度自信。所谓用世界语言丰富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世界性的特点，他除了直接译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之外，还在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将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类比，以探求救国存亡道路。在当下，马克思主义走过了170年的漫长岁月，其批判的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如何借鉴资本主义保障民权、发展生产的有益措施，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用世界语言丰富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体制，凸显公有制的优势，彰显和坚定制度自信。

第三，用时代语言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其内在要求。马君武的马克思主义观基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救国方案相继破产，世界进入革命与斗争时代的时代背景而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而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时代性。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都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内涵，是用时代语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第四，用民族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坚定文化自信。马君武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一个基本前提是将西方语境下的理论转化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即语言形态下的阅读文本。文言文作为中国通行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和正统书面文体，在20世纪初仍在中国阅读、书写习惯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马君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译介全部使用的是文言文，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的语言文化相符合，有助于更多中国人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同。如今21世纪，语言习惯和语言形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性仍然一以贯之。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定要从民族特性出发，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和符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方式形态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文化自信。

总之，马君武生活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影响中国的进程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严谨的求学、翻译精神仍为时代典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3]，我们只有继承前辈的传统，努力奋斗，树立和坚定科学、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不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 马君武·诗文集自序·马君武诗稿[M]·上海：文明书局，1914：1·
- [2] 李提摩太·大同学[N]·万国公报（旧历己亥三月第一二三期），1899-04·
- [3] 马君武·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 拉梅特里）之学说[N]·大陆报（第2期），1903-01-08·
- [4]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N]·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1903-02-16·
- [5] 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N]·新民丛报（第29、30、35号），1903·
- [6] 马君武·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N]·译书汇编（第2年第12号），1903-03-13·
- [7] 马君武·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学说附）[N]·新民丛报（第31号），1903-05-10·
- [8] 马君武·从欧洲归来[N]·广西大学周刊（第3卷第4期），1933-04·
- [9] 马君武·从热河的天富说到今后救国的途径[N]·广西大学周刊（第4卷第3期），1933-03·
- [10] 马君武·斯拉夫民族建国的两种特性[N]·广西大学周刊（第5卷第13、14合期），1933-12-26·
- [11] 马君武·走上俄罗斯的路——民国22年1月9日在北大纪念周演讲·马君武先生演讲集第1集[M]·广西大学出版社·1934：28-36·
- [12] 社论·悼马君武先生[N]·亡国日报，1940-08-03·
-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 [14] 田鹏颖·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分析，2018（1）·

（责任编辑：邓文斌）